

# 符號隱喻與意識形態的美學突圍

——20 世紀八十年代“美學熱”的潮起潮落

李聖傳

[提 要] 作為感性解放的符號隱喻,通過“共同美”、“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以及《巴黎手稿》等論爭,美學不僅負載著後“文革”意識形態突圍重建的思想重任,還因契合社會普遍的情感結構而形成“美學熱”潮。從“先聲”、“起點”到“高潮”再到“降落”、“沉寂”,20 世紀八十年代“美學熱”的潮起潮落,不僅在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潮與意識形態話語拮抗中提供了感性突圍的源動力,還在現代性重建訴求中跨越哲學、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思想領域,並在“新啟蒙”面相中凸顯出美學論爭及其話語實踐的獨特意涵,具有思想啟蒙、感性解放與文化開拓的多重思想史意義。“美學熱”的沉寂,不僅是意識形態成功突圍後變革力量淡化的退場,還是美學話語不斷泛化和實用化後向日常生活的回歸。從公共領域向學科話語的轉型,也預示著美學由歷史中心舞台退場後漸趨回落到知識型美學話語中。

[關鍵詞] 美學熱 符號隱喻 新啟蒙 《巴黎手稿》 八十年代

[中圖分類號] B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2 - 0051 - 14

在“思想改造—百家爭鳴”的“大環境”與“小氣候”中,新中國成立初便旋起了一場全國性的“美學大討論”。儘管這場討論在知識水平、話題論域、思想方法等層面均較為初步,卻激發起人們對於美學的想象與熱情,更培養了一大批青年美學愛好者。只因“極左”勢力蔓延,這次美學熱潮才被迫平息。然而,美學大討論的“未完成性”以及參與這場討論的學人及其學術觀點,卻成為新時期美學再次爆發的起點。在 1978 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促動下,到 1984 年清除精神污染這一時段內,“美學”作為政治隱喻的符號,負載著意識形態思想突圍的話語重任,再次引發社會熱潮。作為思想啟蒙、感性解放與文化開拓的旗幟,“美學熱”的話語實踐及內部張力極具思想史意義。據此,深入勾勒“美學熱”的緣起始末,揭示話語論爭的知識傾向及思想論域,尤其是反思美學話語實踐的歷史複雜性及其隱喻的社會思想主題,在今天顯得尤為必要。

## 一、先聲:後“文革”與“形象思維”再討論(1977~1978)

“美學熱”作為一場感性解放的思想潮流,發源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鬆綁。而意識形態領域

的鬆動,除以“天安門詩抄”“朦朧詩”及“傷痕文學”等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對自由平等價值訴求的文藝表現外,還來自思想領域“自上而下”的文藝政策調整。在文藝與意識形態領域內,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思想方法上對“四人幫”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反抗,而其突破口則是關於“形象思維”的再討論。因此,“形象思維”討論也成為“後文革”語境中思想解放背景下“美學熱”的先聲。

“形象思維”作為一個文藝領域的重要話題,在西方有著漫長的發生發展過程,在中國同樣有著複雜的流變歷程。早在 1930 年代,受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影響,胡秋原《唯物史觀藝術論》、周立波《文藝的特性》以及胡風《劍、文藝、人民》等著作中便對“形象思維”概念有過探討。<sup>①</sup>在 1940 年代,蔡儀在《新藝術論》中也對“形象思維”進行了理論闡釋,提出“藝術的認識是形象的思維”。<sup>②</sup>在 1950 年代向蘇聯學習語境中,從哲學認識論探討形象思維的文章愈發增多。譬如,霍松林《試論形象思維》<sup>③</sup>、陳湧《關於文學藝術特徵的一些問題》<sup>④</sup>、周勃《略談形象思維》<sup>⑤</sup>、黃藥眠《初學集》<sup>⑥</sup>、蔣孔陽《論文學藝術的特徵》<sup>⑦</sup>、毛星《論文學藝術的特徵》<sup>⑧</sup>及李澤厚《試論形象思維》<sup>⑨</sup>等,均就形象思維的特點、過程以及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聯繫區別等進行了探討,更在“百家爭鳴”氣氛中與“美學大討論”形成互動。

然而,到 1966 年《紅旗》雜誌發表鄭季翹《文藝領域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形象思維論的批判》時,“形象思維”問題瞬間被置於“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位置上,並指出:“如果不徹底破除形象思維論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體系,那就等於給反社會主義的文藝在認識論的根本問題上留下一掩蔽的壁壘。”<sup>⑩</sup>自此,“形象思維”與美學問題一道,成為“文藝黑線”的理論禁區。

文藝領域的反“形象思維”,不僅造成藝術情感、藝術精神與藝術形象的喪失,更造成文學領域內“假大空”、“概念化”與“模式化”等諸多弊端。這種不足直至“四人幫”倒台,在清理“文藝黑線專政”的潮流中才被扭轉過來,而其突破口同樣肇始於毛澤東談詩的“形象思維”問題。在中央有關部門安排下,《人民日報》1977 年 12 月 31 日登載了一封《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信中指出:“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如嚼蠟……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sup>⑪</sup>

必須注意到兩點:一是 1977 年 12 月,儘管“四人幫”已倒台,但“兩個凡是”的主張仍在思想文化領域發揮主導作用;二是《人民日報》在重大節日發表毛澤東的信,既是一種理論的方向性指示,又意味著思想領域將此信“作為一個重大行動來處理”。<sup>⑫</sup>僅從信中傳達的內容來看,雖然十分簡短,但毛澤東對“形象思維”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性給予了特別重視,不僅將文藝的藝術標準與政治宣傳區別開來,還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批判地研究文藝理論遺產提供了典範。<sup>⑬</sup>與此同時,儘管這封信是毛澤東 1965 年 7 月 21 日寫給陳毅的,但並不妨礙它在 1977 年底首次發表後再次成為當時文藝界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藉助毛澤東這封信,不僅直接肯定了藝術創作中“形象思維”的重要作用,更否定了此前文藝中出現的諸種“違反文藝創作規律的荒謬主張”。<sup>⑭</sup>

緊接著,《詩刊》、《人民文學》圍繞信的發表紛紛組織召開文藝界座談會,還在 1978 年元旦後陸續刊出圍繞“形象思維”問題的討論文章。《詩刊》座談會紀要寫道:“毛主席在信中,總結了我國歷代詩歌創作的豐富經驗,闡明了詩歌創作以及各種文藝樣式的藝術規律,指明了新詩的發展方向和道路,對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具有極其深遠和重大的意義。毛主席的信,也為我們批判‘四人幫’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和文化專制主義,尤其是為我們當前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

鬥爭,提供了十分銳利的武器。”<sup>⑤</sup>可以說,正是在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歷史基點上,毛澤東這封信的發表具有了歷史轉折性意義。它不僅重啟了文藝界對“形象思維”問題的討論,還意味著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調整。

由毛澤東“形象思維”發表為引子,自1978年起學界再次旋起“形象思維”的熱烈討論,蔡儀、李澤厚等一大批理論家紛紛撰文參與論爭,由此成為社會“感性解放”的突破口。

現在看來,“形象思維”的再次論爭不僅對“徹底砸碎‘反形象思維’論這個精神枷鎖,堅決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sup>⑥</sup>具有重要意義,還有力地澄清了“形象思維”對於文學藝術和美學的重要性。譬如蔡儀指出思維的特點在於它是“形象的”並且“無礙於思維作用,無礙於理性活動,也無礙於思維的邏輯性”。<sup>⑦</sup>饒芃子指出:“文藝作品要塑造藝術形象,就不能不運用形象思維。否定了形象思維,就是否定了文藝的特點,否定了文藝創作的客觀規律,也就是否定了文藝這種社會意識形態”<sup>⑧</sup>。在論爭中,部分學者還就“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及“美的問題”之聯繫與區別進行了探討。李澤厚提出藝術的本質不僅僅是認識,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不僅是認識方式和認識對象的不同,其作為認識的根本意涵也不同,因為形象思維並非從形象到形象,在邏輯思維準備的基礎上,還需各種心理因素的交織,從情感到理解、從知覺到想象等創造性的思維過程。<sup>⑨</sup>蔣孔陽也就“形象思維——邏輯思維”進行了辨析,認為“文學藝術應當按照文學藝術創作的特殊規律,用形象思維來進行藝術構思”。<sup>⑩</sup>隨著討論深入,學者們越發意識到形象思維的重要性並提出:“形象思維是文學藝術認識的規律。美是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徵。形象思維的深入探討,必將涉及美的問題”,“沒有形象當然就沒有美;沒有形象與思維的對立的統一,也就沒有藝術的美”。<sup>⑪</sup>

必須看到,1978年關於“形象思維”再討論是對鄭季翹1966年《紅旗雜誌》所發文章在思想觀點上的撥“亂”與反“正”。借助毛澤東“談詩”重提“形象思維”,不僅是理論層面上就文學藝術與美學問題在學術上的澄清,還是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對文藝專制思想的反駁、調整及其對意識形態的一次試探性抵牾,因而有著獨特的歷史意涵。首先,是理論層面上“未竟”學術爭鳴的繼續。其次,對“文藝黑線專政”思想的撥“亂”反“正”。再次,由“形象思維”帶出對美學問題的思考,促成了思想解放浪潮下“美學熱”的先聲。

總體而言,1978年“形象思維”問題的再討論,作為後“文革”文藝語境中的一樁重要事件,既通過文藝切口為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衝出“文革”營造了氛圍,又在“形象思維”與“美的問題”上為美學形成熱潮提供了感性解放的土壤。

## 二、起點:關於“共同美”問題(1978~1979)

如果說“形象思維”再討論在“人”的感性情感的復歸中為思想文化的鬆動營造了學術氣氛,使得美學問題逐漸升溫並扮演了“美學熱”的先聲,那麼“共同美”問題的提出與討論,則成為“美學熱”的發端。正因“共同美”的討論,不僅直接反駁了盛行已久的“階級論”觀點(即在階級性、人民性的立場上否認文藝與美學中的“人性”與“共同性”),還接洽起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討論”的戰火,再次點燃了老一代美學家以及知識青年的熱情。

從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延安整風”,到1950年代“美學大討論”,再到1960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尤其是“文革”十年,諸如“人性”、“共同美”等話題始終是一大思想禁區。因為“階級性”要高於“人性”,不同階級之間(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地主與貧下中農)不可能存在“共同美”。然而,在撥亂反正的國家意識形態調整期,“共同美”問題與“形象思

維”問題一樣被提上日程。當然，這一敏感話題與“形象思維”類似，觸發點同樣是毛主席對此有過直接論述。起因是1977年《人民文學》第9期發表了何其芳遺作《毛澤東之歌》，首次披露毛主席在談話中曾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美學理論問題，即：“各個階級有各個階級的美。各個階級也有共同的美。‘口之於味，有同嗜焉’。”<sup>22</sup>

毛主席關於“共同美”的意見，無疑給初顯鬆動的思想文化界“人為地衝開了這個禁區”，<sup>23</sup>由此拉開了一場關於“共同美”的爭論。這場討論在1979年前後形成高潮，並在有無“共同美”、“共同美”的意涵、“共同美”的表現以及“共同美”產生原因等層面展開了深入研討。僅就“有無‘共同美’”問題，討論便形成鮮明對立的兩派意見：

一派是少數反對者，堅決否認“共同美”存在。這其中又存在三種不同觀點：一是從“審美活動”出發否定“共同美”，認為“美的意識從誕生的時候起，便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因而在審美活動上無法有“超階級”的“共同美”存在，至於進步作品能引起不同階級“共鳴”也在於藝術作品表現出的“人民性”而非“共同美”；<sup>24</sup>二是從“審美對象”出發，認為美是“勞動歷史的產物”，美與不美由歷史、勞動與人民決定，因而所謂“共同美”也就不存在。三是從“客觀美”出發，認為沒有階級的美也就沒有與“階級美”相對立的“共同美”。<sup>25</sup>

另一派則是絕大多數支持者，充分肯定“共同美”存在，並形成如下三種觀點：其一，美是客觀且不依存於人的主觀意識，因而具有“共同美”。覃伊平認為“美是客觀的，美對不同階級來說應是共同的”，特別諸如桂林山水、西湖美景等“非意識形態的美”尤其如此。<sup>26</sup>其二，美感及來源非常複雜，因而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美感也有“共同美”。朱光潛認為“不同的階級確實有不同的美感”，但因美感及來源異常複雜，因而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階級有共同的美感”。<sup>27</sup>楊振鋒也認為“有些東西確實能引起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人都產生美感”，但必須在“某種條件下對事物取得一致的認識”，尤其是在“自然美和形式美”之中，因此“共同美與美感的階級性並不矛盾”。<sup>28</sup>其三，不同階級有“共同美”，但來源於人們的社會實踐。王振復認為“共同美”源於“客觀存在的美本身的相對共同性”以及“不同階級的人在一定條件下積極的共同的社會實踐所決定”，只有當“階級的人們由於正在從事相對共同的、積極的社會實踐，不懼怕客觀真理，並且能夠對這種真理的形象加以欣賞時，才能面對同一審美對象，產生相對共同的美感”。<sup>29</sup>

在肯定“共同美”存在基礎上，許多學者還反對將“共同美”問題與“階級性”簡單劃等號進而用文藝“政治性”排斥“藝術性”的做法。朱光潛便對“肯定共同美”即“否定階級觀點”進而將“共同美”納入禁區的做法予以了嚴肅批評，認為這是一種“學風問題”，直接破壞了古今中外文藝文化的批判繼承與交流借鑒。<sup>30</sup>鍾子翱也認為“共同美的審美現象，是大量存在的”，決不可“把美感的階級與共同美的審美現象，把政治上的排斥與藝術上的欣賞，完全等同起來”，強調“共同美的問題和‘人性論’混為一談，劃上等號，是不正確的”。<sup>31</sup>

隨著“共同美”問題討論的深入，“共同美”的社會根源、審美主體以及美感心理結構等問題也引發關注。楊治經認為：“在考察和分析產生和形成共同美的社會歷史根源時，必須既要考慮審美對象，又要考慮審美主體。”<sup>32</sup>邱明正提出，美離不開“審美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美的社會性”也不能歸結為“階級性”，因為“審美主體——人、人性、人的本質並不能僅僅歸結為階級性或階級的素質”。<sup>33</sup>朱立元與張玉能則主張“放寬視界，打破禁區”並從“生理、心理基礎”的角度將“共同美”問題的研討轉向“審美主體的內在方面”，因為“共同美”的基礎在於“多數正常人對某些美的事物有共同美感的生理基礎”和“相同的心理結構”，而這些又都是“人類長期社會實踐的結果”。<sup>34</sup>

不難看出，圍繞“共同美”問題的討論，不僅支持“共同美”的聲音佔據上風，還從美感突進到生理、心理等審美主體層面。當然，與“形象思維”一樣，關於“共同美”問題的論爭同樣有著學術層面之外更為重要的時代意義。一是“這次討論對於完整地、準確地闡述共同美的科學涵義，促進美學研究的繁榮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sup>⑤</sup>作為“五十年代美學基本問題討論的繼續和延伸”，<sup>⑥</sup>參與這場論爭的有朱光潛等美學界的老前輩，也有朱立元、張玉能等美學新人，對新時期中國美學的傳承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二是以“共同美”為起點，重新激發起學界對美學的熱情，充分接續起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討論”的戰火，並在意識形態話語的感性突圍中成為“美學熱”的開端，隱喻並負載起感性解放、思想開拓的時代歷史重任。三是以“共同美”為切入點，攜手“形象思維”問題一起突破思想禁區，為進一步碰觸“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等敏感問題奠定了基調。

在後“文革”意識形態調整期，“共同美”與“形象思維”問題討論一樣，均以毛澤東的相關論述作為觸發點，借此權威理據去對抗長久形成的“階級鬥爭”思維，進而衝開意識形態的閘門，實現思想解放。這種意識形態領域的艱難突圍，既有國家意識形態變革的需求，更有廣闊的社會心理基礎和時代土壤。因此，當“共同美”成為思想解放的決堤口後，由此井噴出的社會磅礴動力，不僅扮演了一場狂飆突進式的“美學熱”潮，還將美學推向到社會最前沿，扮演著全社會感性解放與文化開拓的角色功能。一場公共領域內由全民共同參與的“美學熱”，正徐徐拉開帷幕。

### 三、高潮：美學會相繼成立與美學刊物大量發行（1979~1982）

在“形象思維”與“共同美”問題討論沖決下，思想領域的韁繩日漸鬆弛。1978年12月，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以及緊隨其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更加明確地將“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和“促進群眾解放思想、開動腦筋”<sup>⑦</sup>的要求，在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層面向社會發布出來。

解放思想的國家意識形態要求，加上此時正在持續發酵的關於“形象思維”與“共同美”問題討論，“美學熱”的爆發便水到渠成。這種爆發的動因也可從當年“美學熱”最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美學室主辦的《美學》雜誌創刊號的“編後”中得到呈現：

在我國，美學還是一門年幼的學科。解放前，只有少數人進行過零散的研究。解放後，開展過一些學術討論，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十多年來，美學園地，一片荒蕪。現在，“四人幫”倒台了，美學也獲得了新的生機，無論是美學專業工作者還是業餘愛好者，都希望有一個美學刊物。《美學》（第一期）正是這種大好形勢的產物。<sup>⑧</sup>

因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討論”已充分激發起人們對於美學的興趣，限於“極左”思潮的蔓延，美學問題討論才被迫終止。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勢下，繼續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也就大勢所趨。因美學屬於“一門年幼的學科，文化革命前，關於美學方面的一些文章”沒有“專門的刊物發表”，<sup>⑨</sup>但在思想解放的語境下，為配合美學討論，各類美學刊物以及全國各地美學學會組織相繼成立則成為勢不可擋的重要文化事件，並為美學形成全社會的熱潮提供支撐。

學界通常將1979年視為“美學熱”的開端，其標志性事件有三：一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美學室主辦的當代第一本美學專業刊物《美學》問世；二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理論室主辦的《美學論叢》發行；三是各種美學專著大量出版。

1979年1月，由李澤厚實際負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美學室和上海文藝出版社文

藝理論編輯室合編的《美學》<sup>40</sup>正式出版,這也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的第一份專業刊物,俗稱“大美學”。這份刊物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作者群廣泛,但主要以“實踐美學”的擁護與建構為主;二是內容豐富、視野廣闊,除關注“形象思維”、“巴黎手稿”等熱點問題外,還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古典美學、蘇聯美學以及西方現代美學的研究論文;三是重視美學研究與藝術的關聯,尤其強調對門類藝術的探索,大大拓展了美學研究的空間,對當代美學學科的發展起到助推作用。

緊隨其後,蔡儀負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理論室編的《美學論叢》<sup>41</sup>也宣告問世,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俗稱“小美學”。這份刊物的特點同樣有三:一是作者群基本固定,大多是蔡儀學生以及持蔡儀相似觀點的學者;二是重視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作品的討論研究;三是與李澤厚“大美學”辦刊思路一致,蔡儀“小美學”同樣十分重視對中西美學與藝術的關注,有力地促進了文藝學界對於中西方美學、文論的研究興趣。

與上述兩份“同人”刊物相伴而行的是各種美學專著得以陸續譯介和出版。黑格爾《美學》(商務印書館)、蘇聯鮑列夫《美學》(商務印書館)、匈牙利巴拉茲《電影美學》(中國電影出版社)、劉丕坤翻譯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劉綱紀《書法美學簡論》(湖北人民出版社)、施昌東《先秦諸子美學思想述評》(中華書局)以及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人民出版社)等相繼出版,極大推動了社會對美學的關注和研究熱情。到1980年,“美學熱”真正進入高潮,這尤其表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美學刊物繼續大量創刊發行。《美學譯文》在創刊號“後記”中明確指出:“為了適應廣大哲學、美學、文藝理論工作者及美學業餘愛好者的迫切需要……組織編譯了《美學譯文》……介紹美、英、德、俄、日、意等國有代表性的美學著作和美學論文。”<sup>42</sup>從刊登文章看,的確體現了國別、譯文的多樣化:既有歐美美學也涉及東歐與日本美學,既有哲學美學、心理美學、門類美學也有對經典專著的介紹,尤其是對當代外國美學思潮如結構主義美學、符號學美學、格式塔美學等均有介紹。

其次,《美學》第2期發表了朱光潛重譯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此為引子又刊發了朱光潛《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美學問題》、鄭湧《歷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的美學思想》和張志揚《〈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美學思想》三篇對“巴黎手稿”解讀的論文,引發了學界持續多年的“手稿熱”。《巴黎手稿》與馬克思主義美學問題,也成為“美學熱”中極為重要的一頁。

再次,1980年6月4日至11日“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在昆明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美學大會。這次歷經多時籌備的美學會議,不僅得到中宣部主管文藝工作的負責人周揚的指導,<sup>43</sup>還選舉出周揚為名譽會長、朱光潛為會長,制定了“學會工作計劃綱要”<sup>44</sup>以及“關於美學工作的情況和建議”,同時還成立了“全國高等學校美學分會”,由馬奇擔任會長。<sup>45</sup>會後,關於美學大會的成立以及學術研討情況,《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國內哲學動態》以及《美學》等刊物都進行了詳細報道,引發全國關注,由此形成極為深遠的影響。<sup>46</sup>

此外,教育部同年10月又委託新成立的“全國高等學校美學分會”和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聯合舉辦了全國高校首次美學教師進修班,以適應高等院校對美學課程的迫切需要。進修班先後邀請到朱光潛、王朝聞、汝信、蔡儀、李澤厚、馬奇等著名美學家到場授課,培養了一大批美學師資力量,滿足了全國高校學子的渴求。1981年1月培訓結業後,由講稿匯編而成的《美學講演錄》於10月出版,引發廣泛反響。隨後,全國各高校紛紛開設美學課程,招收美學研究生,美學盛況空前。

以上“刊物熱”、“手稿熱”和“中華美學學會”成立及其後續效應,不僅構成了“美學熱”的重要

表徵，還反哺推動著“美學熱”的縱深推進。到 1981 年，“美學熱”進入全盛期，並開始向全社會各領域蔓延。

一是 2 月 25 日，由共青團中央以及中華美學學會等聯合發起的“五講四美”活動在意識形態力量的促動下開始向全國推行。作為“美學熱”的重要社會表徵，其對“美學熱”同樣起到推波助瀾的效果。在“五講四美”活動的號召下，“為了培養青少年對自然界、社會生活、文藝作品健康的審美觀點，提高他們識別美醜的能力，以養成高尚的情操，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sup>④</sup>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創辦了《美育》叢刊，受到讀者好評，被譽為“進行‘五講’‘四美’活動的好教材”，<sup>⑤</sup>配合並促進了“美學熱”的發展。

二是 1 月和 3 月，繼中華美學學會成立之後，“上海市美學學會”和“湖北省美學學會”相繼成立並各自舉行了第一次美學學術研討會。上海市美學學會選舉蔣孔陽先生為會長，主張總結藝術實踐，開展多樣化的活動為中國美學發展做貢獻。<sup>⑥</sup>湖北省美學學會選舉劉綱紀先生為會長，並圍繞“人的本質和美學的關係”、“中國古代美學”、“美學研究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議題進行了研討。<sup>⑦</sup>

三是 6 月 29 日至 9 月 28 日，受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委託，上海美學學會和上海戲劇學院聯合舉辦了全國高校美學第二期教師進修班。此次進修班同樣邀請到李澤厚、劉綱紀、汝信、朱狄等著名美學家進行學術報告，並組織了各種藝術欣賞活動。<sup>⑧</sup>

此外，除“五講四美”活動向全國推廣以及各地美學分會紛紛成立並舉行各種研討活動外，多種重要美學著作也紛紛出版。“美學熱”由此進入鼎盛時期。

1982 年，“美學熱”繼續保持旺盛發展的勢頭，不僅圍繞《巴黎手稿》等美學問題發表了多篇論爭文章，還接連創辦了多份美學刊物，其熱潮還開始向其它學科延伸拓展。

首先，美學刊物繼續大量創辦發行。山東人民出版社由蔡儀主編的《美學評林》創刊，在“發刊詞”中強調“不是為了立一家之言，或者先存門戶之見，而是想作為在美學方面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一個小小園地”。<sup>⑨</sup>重慶出版社由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和重慶市文聯編的《美的研究與欣賞》創刊，在“發刊詞”中同樣提出“普及美學知識、提高人們審美能力”的希望。<sup>⑩</sup>同時，重慶出版社由四川省社科院文學所編的《美學文摘》創刊，這份文摘可謂是學術資料性的重要刊物，主要以摘編報刊上有代表性的美學論著為主。<sup>⑪</sup>此外，在 1982 年後，中國藝術研究院外國文藝研究所編的《世界藝術與美學》創刊、武漢大學出版社劉綱紀編的《美學述林》創刊、復旦大學出版社蔣孔陽主編的《美學與藝術評論》創刊<sup>⑫</sup>、商務印書館汝信主編的《外國美學》創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胡經之主編的《文藝美學論叢》創刊，以及《美學新潮》《美學文獻》、《技術美學》、《藝術美學文摘》等刊物，也如雨後春筍般發行，顯示出美學熱潮的強勁動力。

其次，隨著“美學熱”的持續發酵，美學逐漸向其它學科輻射拓展。如哲學、文藝學研究也紛紛轉向美學，尤其是“文藝美學”的學科拓展，為美學與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並獲得持續發展。從 1980 年胡經之在中華美學會議上提出“文藝美學”，到 1982 年發表《文藝美學及其它》，到 1986 年山東大學中文系發起召開的“首屆全國文藝美學討論會”，再到新世紀以來文藝美學學科方向的繁榮發展，可以說“美學熱”不僅為文藝美學學科的草創發展提供了沃土，還為美學自身的學科縱深拓展開辟了新航向。<sup>⑬</sup>

再次，“美學熱”不僅引發各地學生自發性的成立“美學興趣小組”，還促成了美學研究生的“報考熱”潮。當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美學研究生的競爭極為激烈。受此

影響,高建平、王一川、王嶽川、張法、徐碧輝等青年學子均紛紛選擇報考美學領域的研究生,對當代中國美學的學科發展形成重要影響。

此外,受美學的知識刺激,諸如文藝領域內“文藝審美本質”等問題也成為當時不斷論爭的話題,而詩歌領域“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乃至“主體性論爭”的發動,也均與當時的“美學熱”潮流緊密關聯。當然,在1982年“美學熱”的強勁熱潮中,美學著作也持續著此前的出版熱潮。如蔡儀《美學論著初編》、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宗白華《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選》、高爾泰《論美》等,均在此時陸續出版。

從1979《美學》創刊,到各級美學學會先後成立、各類美學刊物相繼創刊、各種美學培訓班陸續舉辦,再到美學在高校學子中的廣泛歡迎,均映襯出時代對“美”和“美學”的渴求。作為人們感性表達原始慾念、生命衝動以及追求自由的情感宣洩的隱喻符號,美學話語深深擊中了時代精神的血脈。尤其當這種“美學熱”過渡到“文化熱”,與中國感性審美傳統和“現代化”相關聯時,更爆發出感性解放之外更高層面的思想動力。當然,思想解放背景下意識形態的鬆綁為美學發展提供了契機,也是“美學熱”真正得以興起、鼎盛並引發全社會熱潮的底色所在。而一旦這種感性解放的話語渴求與意識形態相抵牾,其內部的思想動力則會收縮,其“熱度”也勢必退潮。

#### 四、降落: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3~1984)

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美學熱”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獲得了思想文化領域的支撐,有效扮演著走出“文革”的思想解放重任,因而其營造的社會“熱潮”也滾滾向前。然而,到1983年,由馬克思“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引發的思想戰線上的“清除精神污染”政策,對“美學熱”形成了重要衝擊並使其逐漸退潮。緣起在於1983年3月7日,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在中央黨校所作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sup>58</sup>特別是“對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講法”引發了中宣部尤其是胡喬木的不同意見,引起鄧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視。為此,在1983年10月12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這一重要講話,就“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尤其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作出重要指示。講話中嚴肅指出:

理論界文藝界還有不少的問題,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和道德問題,當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討論的。但是人道主義有各式各樣,我們應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在革命年代我們叫革命人道主義),批評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sup>59</sup>

中央高層對“人道主義和異化觀點”的批評,尤其從黨的思想戰線高度上對社會思想領域“精神污染”現象的定調,使得中宣部連續召開涉及新聞、廣播、電視等多部門的會議布置,要求在文教宣傳各領域加強“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導。<sup>60</sup>受此影響,社會各階層掀起了一股“清除精神污染”的潮流。至1983年,各種期刊報紙上,以“清除精神污染”為題發表的文章就達140多篇,內容涉及各個領域。在學術領域,正如《文史哲》所指出的:“思想文化界的精神污染問題”要特別地加以重視,尤其是“抽象地談論人的本質、人的價值和人性、人道主義等問題”,是“思想文化界的精神污染”的一個嚴重問題,“決不可以輕視”,它不僅可能“在思想上造成嚴重的混亂”,還可能“在政治上起離心離德的消極作用”,關係到“政治原則”問題。<sup>61</sup>



受“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影響，正如火如荼進行的“美學熱”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衝擊。尤其是關於“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作為“美學熱”的重要組成部分，更被直接遏止。據資料統計，作為當時“美學熱”的重要載體，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主辦的《美學》發表了大量引發爭議的美學研究論文。但受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影響，關於馬克思“異化”概念等問題的討論，此時已經變成敏感的政治概念。尤其是《巴黎手稿》中關於生產勞動、美的創造等理論問題的探討均不能避開“異化”理論，因而便具有了“精神污染”的嫌疑。由此，原本《美學》第五期組織好的研究“手稿”的一組“重頭文章”被出版社“不經商量”地“撤掉”，因出版社領導怕“引火燒身”。<sup>④</sup>如果說，此事件尚無法足以說明“美學熱”受“清除精神污染”而開始逐漸“退潮”，那麼其餘幾份刊物的出版發行量或許也能提供某些佐證。據王善忠回憶，《美學論叢》曾有過“輝煌的年代”，“第一輯印過三次，累計四萬五千冊；第二輯也印過兩次，累計二萬九千五百冊；第三輯印行一萬二前五百冊；第四輯印了一萬三千九百冊。但此後，每況愈下，到了第十、十一輯，各輯只印行一千一百冊。”<sup>⑤</sup>從1979年第一輯開始的輝煌到1983年第五輯開始的衰落，除出版社方面因政策調整發生的原因外，或許與當時整個思想風氣的轉型和“美學熱”的降落不無關係。

無獨有偶，高爾泰在1983年11月2日為《美是自由的象徵》寫作“前沿”時，也指出：“‘美學熱’正在悄悄地降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哲學、宗教哲學以及社會學、未來學、人才學等等的日益高漲的興趣。”<sup>⑥</sup>與此同時，高爾泰在“前沿(二)”中還指出：

我原先並沒有計劃要出這麼一本書。本想繼《論美》之後，出一本《論人》。某出版社已將《論人》列入出版計劃，並作了預告。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一九八三年那時，《論美》被禁止重印，《論人》的出版計劃也同時被取消。本人也由於講了人道主義，被停止上課，連研究生也不准帶了。形勢一時十分緊張，處境一時十分困難。<sup>⑦</sup>

如上種種，已充分表明，因“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引發的“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識形態話語要求，使得“美學熱”受到直接衝擊。不僅關於“人性、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論爭受到遏止，圍繞相關問題的美學論爭也受到衝擊干預。有學者便指出，“美學熱”的分期，“從1982年至1983年，‘美學熱’顯然已跨入後期”，<sup>⑧</sup>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當然，作為“美學熱”降落的退潮期，餘溫尚存。僅就美學學術領域而言，儘管發行量急劇減少，但各種美學書籍仍在大量出版，各種刊物仍在不斷發行甚至創刊，各種美學活動也仍不斷舉行。

首先，各種美學活動仍在如火如荼舉行。除1983年初趁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不斷深入的關於馬克思與“巴黎手稿”的美學討論及相關座談會議外，其它一些美學活動同樣吸引了大量學者的積極參與。如1983年10月7日至13日在廈門大學舉行的“中華全國美學學會第二屆年會”；<sup>⑨</sup>10月17日至22日由江蘇省美學學會、《江蘇畫刊》編輯部、省社科院文學所聯合主辦的“中國美學史學術討論會”；<sup>⑩</sup>1984年10月13日至18日由中華全國美學學會、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研究會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雜誌編輯部聯合舉辦的“全國美育座談會”；<sup>⑪</sup>1984年10月24日至27日，中華全國美學學會與湖北省美學學會等單位在武漢聯合舉辦了“中西美學與藝術比較討論會”，<sup>⑫</sup>等等。

其次，各種適應“美學熱”潮流與需求的書籍仍在大量出版。為適應“電大學員”以及“其他有興趣學習美學的讀者”的需求，1983年齊一、馬奇等編著了《美學專題選講匯編》，<sup>⑬</sup>對美學基礎理論、各種美學門類的知識以及中國古代、蘇聯等美學知識進行了介紹。1983年汝信《西方美學史論叢續編》以及王朝聞《審美談》出版。1984年，開創中國美學史先河的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

史》出版,呂葵《呂葵文藝與美學論集》以及朱狄《當代西方美學》也相繼出版。

再次,各種成系列的“美學叢書”仍在相繼出版。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李澤厚主編的“美學譯文叢書”。該叢書雖然著手於“全國第一次美學會議”前後,但首次出版卻到了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繆靈珠翻譯的喬治·桑塔耶納的《美感》。隨後,從1983年、1984年直至1992年,又陸續出版了40多本美學著作。<sup>①</sup>這套叢書在當時的出版,可謂是“美學熱”的結果,不僅促動了“美學熱”的進行,還為隨後“美學熱”向“文化熱”的充分展開與縱深拓展奠定了學術基礎,因而仍在餘溫中發揮其社會效應並持續其熱潮。

## 五、沉寂：“方法論”轉型與“美學熱”的退潮(1985)

在當代中國文藝思想史中,1985年被公認為“方法論年”。在八十年代,方法熱是文化熱的重要表徵,卻更與“美學熱”交相輝映、密不可分。尤其是“清除精神污染”形勢下對馬克思“人道主義”意識形態的劃分,使得人們逐漸偏離對馬克思“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以及《巴黎手稿》的經典詮釋,並走出“以詮釋馬克思為中心”的美學傳統路線,轉移到對美學方法論探尋上。這正是1985年成為“方法論年”至為關鍵的內在線索。

在意識形態干預以及西方文論思潮譯介的雙重影響下,人們不得不由對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詮釋,走向到對美學方法論的轉型探求。因此,在1985年前後,美學與文藝理論界幾乎人人熱衷談論方法。

僅1985年,廈門、揚州、武漢就召開多次全國性“方法論”問題學術研討會,北京、上海還成立了“新方法”專門研究室。一時間,“方法論”熱度空前。這種學科方法意識的轉型,使得人們紛紛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中吸收最新成果並與美學文藝學研究相結合。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模糊數學理論、耗散結構理論、突變理論等新的科學方法的運用中,文藝學美學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研究視野得到開拓。

從研究視野看,最具代表性的如:林興宅《論文學藝術的本質》<sup>②</sup>、劉再復《用系統分析方法分析文學形象的嘗試》<sup>③</sup>等對系統論的借鑒;黃海澄《從控制論觀點看美的客觀性》<sup>④</sup>及《從控制論觀點看美的功利性》<sup>⑤</sup>、紫川《運用控制研究文藝與美學》<sup>⑥</sup>等對控制論的借鑒;姜慶國《信息論美學初探》<sup>⑦</sup>、王一川《從信息觀點看藝術》<sup>⑧</sup>、野桃《運用信息論研究文藝和美學》<sup>⑨</sup>等對信息論的借鑒。

從研究領域看,美學研究已經從此前很長一段時期內對“美的本質”、“美學研究對象”等馬克思主義美學路線轉移到其他研究領域中,尤其是技術美學、生產美學、環境美學、景觀美學、服裝美學等領域。美學研究中運用新方法,不僅拓展了美學的研究視野,還使得美學學科呈現出多元發展態勢。運用新方法論對美學的研究,也逐漸脫離傳統形而上學的哲學路線,更多地與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結合。這些自然科學方法論對於美學研究的推動,使得美學研究除在對既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又有自然科學方法對美學研究視野的開拓,使得美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必然趨勢。<sup>⑩</sup>

1985年“方法論熱”對於美學、文藝學的開拓,貢獻無疑是多方面的。王世德總結說,在“新的角度與途徑研究美學界懸而未決的難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一體化交融進而產生亦此亦彼的交融性學科”、“面向廣闊的生活中多樣的審美領域”、“啟發美學廣開門路,兼收並蓄、面向各個學派”、“學科縱深發展與滲透綜合”、“橫向新興學科的出現”<sup>⑪</sup>等方面,都有歷史貢獻。尤其是1985年“方法論熱”還改變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學研究中重觀念輕方法乃至沒有方法論自覺的缺陷,極

大激發了美學研究的熱情，還形成了美學研究多元方法論的格局。當然，其局限也是明顯的，除科學主義思潮背景下“方法論”熱潮表現出一種“純技術運用”的傾向外，“將方法出新等同於觀念創新”、“混亂了方法的層次秩序與相應規範，忽視美學研究方法的特殊性”<sup>⑧</sup>也是研究中顯露出的缺陷。

除對“方法論熱”歷史功過的省思外，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之後的1985年，也就是“美學熱”業已退潮後，為何會再次上演這樣一場同樣影響廣泛的“方法論熱”？冷靜來看，“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情下對自然科學的提倡與重視。歷經“文革”多年，社會各領域均處於百廢待興局面，這尤其需要自然科學的力量加以改變。受此影響，“科學主義”成為一種社會進步與改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包括人文科學領域在內的知識界各行各業中，大量引入和學習自然科學理論，便成為一種趨勢。

二是改革開放背景下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大量譯介和影響。西方文藝思潮的譯介，既為文論美學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也極大拓展了人們的學術視野，使得在學術研究中敢於打破傳統並大膽引入新知識、新視野，進行學術理論創新。

三是時代思想環境的更替和政治理想的模式改變。“美學熱”的爆發正是人們尋求“感性解放”與“人性覺醒”的符號隱喻，並通過“學術論爭”的話語方式得以登場與蔓延。與此不同的是——到1985年前後，“文革”陰霾逐漸散去，在新的時代環境影響下，尤其是西方思潮的不斷湧動與刺激，“新一代”知識青年的成長已不滿足於對馬列傳統的詮釋，而是希冀創新與變革。尤其是希望在以歐美發達國家的政治模式中尋求“現代化”的中國出路。於是，“方法論”的爆發不僅是“美學熱”基礎上美學文藝領域的理論變革，更是一種學科範式的轉型以及方法論自覺創新後社會政治理想的模式變革。

從某種層面上看，“方法論”的興起恰恰預示著“美學熱”的退潮，並在“現代化”與“文化中國”等新的理論問題域與社會政治模式探尋下，被新一輪的“文化熱”所替代。這種“美學熱”向“文化熱”的過渡，既預示著社會思想發展潮流向更高形態的知識演變，又意味著美學研究逐漸回歸到正常學科之後的理論沉寂。

1985年，促動“美學熱”的社會因素逐漸彌散，時代思想轉型和新一代知識青年的崛起，尤其是各種“叢書”為代表的“西學熱”及其表徵的“文化現代性”社會新思潮的湧動，均使得“美學熱”漸被“文化熱”取代後趨於沉靜。此後，“美學熱”時期創辦的各種刊物也在這種淡化趨勢中被迫紛紛停刊，如：劉綱紀《美學述林》1983年6月只辦一輯即停刊，蔡儀《美學評林》1984年第七輯後停刊，李澤厚1987年11月《美學》第七期後停刊，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理論室編《美學論叢》1987年12月第九輯後停刊，四川省社科院文學所《美學文摘》1988年第六輯後停刊，等等。這些現象均可視為“美學熱”退潮的知識型標志。

以上從“先聲”、“起點”到“高潮”再到“降落”與“沉寂”，基本厚描出1980年代“美學熱”潮起潮落的事件進程。作為後“文革”意識形態危機及其“現代性重建”與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潮相融合的產物，“美學熱”通過對“共同美”、“人性、人道主義及異化”等問題的探討，實則在與意識形態話語的拮抗中提供了一種感性解放的動力，由此成為社會思想變革的中心。馬克思“人道主義”與後“文革”意識形態重建的訴求，也構成了“美學熱”最為核心的結構基礎。作為一種感性解放的符號隱喻，“美學熱”與意識形態的話語突圍相輔相成並在這種源動力的支撐下通過“精神文明建設”等

形式獲得了全社會的廣泛參與，進而形成鼎盛之勢。但當這種社會熱潮逐漸失去思想基礎，尤其是與官方意識形態相抵牾時，其思想熱潮便歸於沉寂並由“公共話語”回落到“學科話語”中，最終在新的時代語境內被“文化熱”所取代。

總之，意識形態的思想變革直接決定著 1980 年代“美學熱”的潮起潮落過程，美學話語亦負載著走出“文革”以及“後文革”意識形態思想話語重建的新啟蒙重任。作為感性解放的符號隱喻，歷史使命的完結宣告著扮演公共話語的美學在退出歷史中心舞台後，終將回落到作為知識型的學科話語中。

- 
- ①參閱王敬文、閻鳳儀、潘澤宏：《形象思維理論的形成、發展及其在我國的流傳》，《美學》第 1 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 年，第 200~201 頁。
  - ②蔡儀：《新藝術論》，見《美學論著初編》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年，第 11~14 頁。
  - ③霍松林：《試論形象思維》，北京：《新建設》，1956 年 5 月號。
  - ④陳湧：《關於文學藝術特徵的一些問題》，北京：《文藝報》，1956 年第 9 期。
  - ⑤周勃：《略談形象思維》，武漢：《長江文藝》，1956 年 8 月號。
  - ⑥黃藥眠：《初學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57 年。
  - ⑦蔣孔陽：《論文學藝術的特徵》，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 年 10 月。
  - ⑧毛星：《論文學藝術的特徵》，北京：《文學評論》，1957 年第 4 期。
  - ⑨李澤厚：《試論形象思維》，北京：《文學評論》，1959 年第 2 期。
  - ⑩鄭季翹：《文藝領域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形象思維論的批判》，北京：《紅旗》，1966 年第 5 期。
  - ⑪毛澤東：《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北京：《人民日報》，1977 年 12 月 31 日。與此同時，《光明日報》、《廣州日報》乃至《峰峰礦工報》等地方報紙均於當天轉載刊發。
  - ⑫華迦：《鄭季翹批判形象思維論始末》下，北京：《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06 年 8 月 15 日。
  - ⑬馬積高：《光輝的指示 銳利的武器：學習〈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的初步體會》，長沙：《湖南師院學報》，1977 年第 4 期。
  - ⑭韓罕明：《指路的明燈 克敵的武器：學習〈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的初步體會》，長沙：《湖南師院學報》，1977 年第 4 期。
  - ⑮《毛主席仍在指揮我們戰鬥——學習〈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座談會紀要》，北京：《詩刊》，1978 年第 1 期。
  - ⑯龐安福：《批判“反形象思維”論的銳利武器——學習〈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的體會》，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78 年第 1 期。
  - ⑰蔡儀：《批判反形象思維論》，北京：《文學評論》，1978 年第 1 期。
  - ⑱饒芃子：《形象思維是文藝創作的規律和方法》，廣州：《學術研究》，1978 年第 1 期。
  - ⑲李澤厚：《形象思維續談》，廣州：《學術研究》，1978 年第 1 期。
  - ⑳蔣孔陽：《形象思維與藝術構思》，北京：《文學評論》，1978 年第 2 期。
  - ㉑崔緒治：《形象思維與美》，江蘇蘇州：《江蘇師院學報》，1978 年第 1 期。
  - ㉒何其芳：《毛澤東之歌》，北京：《人民文學》，1977 年第 9 期。
  - ㉓㉔樓昔勇：《關於“共同美”的討論》，上海：《文藝理論研究》，1980 年第 2 期。
  - ㉕陳東冠：《“共同美”在哪？》，上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 年第 1 期。
  - ㉖覃伊平：《小議“共同美”》，南寧：《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79 年第 1 期。
  - ㉗㉘朱光潛：《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北京：《文藝研究》，1979 年第 3 期。
  - ㉙楊振鋒：《要辯證地認識共同美》，上海：《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 年第 6 期。

②王振復：《從社會實踐看“共同美”》，上海：《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

③鍾子翔：《論共同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5期。

④⑤楊治經：《論人性與共同美》，上海：《學術月刊》，1980年第9期。

⑥邱明正：《再論共同美》，上海：《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

⑦朱立元、張玉能：《淺談共同美的生理、心理基礎》，上海：《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

⑧潘家森：《“共同美”研究簡介》，北京：《國內哲學研究動態》，1980年第2期。

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頁。

⑩《美學·編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第285頁。

⑪于麟：《〈美學〉（第一期）、〈美學論叢〉（1）相繼出版》，北京：《出版工作》，1980年第1期。

⑫從1979年1月創刊至1987年11月停刊，共出版七期。

⑬從1979年5月創刊至1987年12月停刊，共出版九輯。該刊在“編後記”中注明：“在黨中央關於全黨工作中著重點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號召下，在黨的發揚科學民主，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我們為要在美學研究工作中貢獻一點微薄力量，編輯這個不定期的叢刊”。參見《美學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243頁。

⑭《美學譯文·後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314頁。

⑮在學會成立之前，周揚還專門就“美學大會”以及“美學研究工作”進行了指導，指出：“四化建設需要美學”，尤其是“在人民群眾之中，特別是廣大青少年，實有一股渴望學一點美學知識的很高的熱情。這種追求美的熱情是我國人民在清除了‘四人幫’之後，精神上獲得解放的表現，是十分可喜的事情。它反映出，人們經過十年動亂，飽嘗痛苦辛酸，看夠了‘四人幫’一夥的醜惡表演和由他們所造成的無數醜惡現象之後，要求過真正美好生活的強烈願望。”周

揚還指出，美學研究需要馬克思主義指導，要整理“中國美學的遺產”和“重視審美教育，加強美育研究”，此外還需注意學術問題需要鼓勵“自由討論”等。周揚：《關於美學研究工作的談話》，上海：《美學》，1981年第3期。

⑯除各種學術研究工作外，還提出“協助實施美育，普及美學知識”等事宜。

⑰參見《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簡報》第8期，1980年6月11日。

⑱王一川回憶道：“1978年初，我作為恢復高考後第一屆（77級）大學生進入四川大學中文系”，此時，“全國性的美學熱浪湧進了川大。首屆中華全國美學會議（1980）在昆明剛結束，美學家李澤厚就應邀順道來講學”，“我們早早地就輪流去‘佔’座位，大抵為的是一睹這位‘著名青年美學家’的風采，感受中華美學學會成立的喜訊和美學發展的新動向。前去聽講的文理科同學都有。講演時座無虛席，連過道和窗台都擠滿了人（窗玻璃也被擠碎了），大家屏住呼吸，似乎要努力聽清美學家的每一個字眼，聽過後還充滿求知渴望地去提問。在這令人暈眩的美學熱中，你如何能不深深地卷入？”參見王一川：《從哲學思辨到文學闡釋——我在美學熱潮中的經歷片段》，上海：《中文自學指導》，1996年第9期。

⑲陳望衡：《湖南人民出版社創刊〈美育〉叢刊》，北京：《國內哲學動態》，1980年第8期。

⑳龐亭：《湖南創辦〈美育〉叢刊》，北京：《出版工作》，1981年第8期。

㉑參見《上海市美學學會》，上海：《中文自學指導》，2008年第5期。

㉒南爾：《湖北省美學學會成立並舉行第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海：《美學》，1982年第4期。

㉓李長波：《第二期全國高校美學教師進修班結業》，上海：《美學》，1982年第4期。

㉔孫午：《〈美學評林〉叢刊問世》，北京：《光明日報》，1983年1月6日。

㉕⑤④蔣孔陽：《美學與藝術評論》（第一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448頁；第448頁。

㉖《美學與藝術評論》1984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蔣孔陽任主編，刊物明確定位為“上海的美學園地”。蔣孔陽：《寫在〈美學與藝術評論〉出版的時

候——代前言》，上海：《上海文學》，1984年第5期。

⑤⑥曾繁仁：《中國文藝美學學科的產生及其發展》，北京：《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

⑤⑦該文未經胡喬木、鄧力群等主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同志的同意，《人民日報》便於1983年3月16日予以發表，為此，《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以及副總編輯王若水被指“嚴重違反組織紀律”並要求作“書面檢討”。後王若水被調出《人民日報》。參見盧之超：《80年代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⑤⑧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資料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53頁、354頁。

⑤⑨盧之超：《80年代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

⑥⑩《清除精神污染，堅持學術研究的正確方向》，濟南：《文史哲》，1983年第6期。

⑥⑪聶振斌：《大〈美學〉的時光》，靳大成主編：《生機：新時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第471頁。

⑥⑫王善忠：《有關〈美學論叢〉的始末》，靳大成主編：《生機：新時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第467頁。

⑥⑬⑭高爾泰：《美是自由的象徵·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頁；第3頁。

⑥⑮祝動力：《精神之旅——新時期以來的美學與知識分子》，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第141頁。

⑥⑯潘知水：《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廈門年會紀要》，北京：《國內哲學動態》，1984年第1期。

⑥⑰馬鴻增：《中國美學史學術討論會紀要》，北京：《國內哲學動態》，1984年第3期。

⑥⑱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中國哲學年鑒1985》，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第333~334頁。

⑥⑲參見彭富春《中西美學藝術比較討論會綜述》（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

期）、鄂美：《中西美學藝術比較討論會紀要》（北京：《國內哲學動態》，1985年第1期）。

⑦⑩齊一、馬奇等編著：《美學專題選講匯編》前言，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1頁。

⑦⑪李澤厚：《關於“美學譯文叢書”》，北京：《讀書》，1995年第8期。

⑦⑫林興宅：《論文學藝術的本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

⑦⑬劉再復：《用系統分析方法分析文學形象的嘗試》，北京：《讀書》，1984年第7期。

⑦⑭黃海澄：《從控制論觀點看美的客觀性》，蘭州：《當代文藝思潮》，1984年第1期。

⑦⑮黃海澄：《從控制論觀點看審美的功利性》，蘭州：《當代文藝思潮》，1984年第3期。

⑦⑯紫川：《運用控制研究文藝與美學》，北京：《文藝研究》，1985年第3期。

⑦⑰姜慶國：《信息論美學初探》，蘭州：《當代文藝思潮》，1985年第1期。

⑦⑱王一川：《從信息觀點看藝術》，蘭州：《當代文藝思潮》，1985年第3期。

⑦⑲野桃：《運用信息研究文藝與美學》，北京：《文藝研究》，1985年第3期。

⑧⑰朱立元：《美學研究的方法應當多元化》，上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

⑧⑱王世德：《評美學研究新趨勢》，成都：《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

⑧⑲譚好哲、韓樹堂：《1985年前後美學研究方法論熱的學術史反思》，瀋陽：《社會科學輯刊》，2009年第5期。

作者簡介：李聖傳，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美國爾灣加州大學公派訪問學者（CSC）。北京 100089

[責任編輯 桑海]